

2000.元.14

香港文学史

潘亚暾 汪义生

鹭江出版社

香港文學史

王光英



[闽]新登字 08 号

香港文学史

潘亚暾 汪义生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编:361009)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六印路 30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27.125 印张 4 插页 652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80610—486—0

I · 90 定价:38.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香港新文学的发轫(1920—1936)	(23)
香港文学溯源(23)顽固的封建旧文学堡垒(25)鲁迅在香港的演讲(27)新文学悄悄地萌芽(30)文艺刊物和文学社团(34)充满反叛精神的白话小说(40)崛起的新诗群(45)散文园地的拓荒(55)草创时期的影剧(57)内地新文学对香港文坛的影响(59)	
第二章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坛(1937—1945)	(61)
抗战时期的全国文化中心(61)雨后春笋般的文艺刊物(68)如火如荼的文学活动(71)此起彼伏的文艺论争(80)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86)小说概述(90)《腐蚀》等长篇小说(95)萧红及其《呼兰河传》等小说(99)许地山及其《铁鱼的鳃》等小说(104)夏衍、萧乾、端木蕻良的小说(111)诗歌概述(119)戴望舒及其《灾难的岁月》(127)杨刚、袁水拍、徐迟、林林、杜埃、芦荻、鸥外鸥的诗(134)散文概述(147)刘思慕、华嘉的散文(161)戏剧、电影文学概述(164)儿童文学的起步(171)	
第三章 战后的香港文坛(1945—1949)	(176)
梅开二度(176)文艺刊物和出版景观(180)频繁的文学活动(183)小说概述(185)黄谷柳及其《虾球传》(192)司马文森、陈残云、秦牧的小说(196)诗歌概述(203)黄宁婴的诗(209)散文概述	

(212) 黄秋耘、楼栖、秦似们的散文(215) 戏剧、电影文学新貌(220) 儿童文学一览(226)

第四章 左、右两派壁垒分明的文坛(1950—1959)

..... (229)

“美元文化”现象(229) 文学园地、社团及活动(234) 小说概述
(236) 俗伦及其《穷巷》(243) 徐速及其小说(247) 夏易的小说(254)
各种通俗小说(257) 金庸、梁羽生及其新武侠小说(263) 诗歌概述
(275) 马博良的诗(278) 散文概述(281) 曹聚仁及其散文(283) 戏
剧、电影文学概述(287) 文学评论概述(291)

第五章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存的文坛(1960—1969)

..... (294)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294) 文学园地、社团及活动(298)
小说概述(300) 刘以鬯及其《酒徒》(305) 徐訏及其小说(313) 唐人、
李辉英的小说(320) 舒巷城的小说(328) 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空前繁
荣(334) 依达的言情小说(348) 卫斯理的科幻小说(350) 诗歌概述
(353) 散文概述(359) 叶灵凤、司马长风的散文(374) 戏剧、电影文
学概述(381) 文学评论概述(385) 黄继持的文学评论(388)

第六章 开始横向交流的文坛(1970—1983) (392)

在剧烈震荡中迎来转机(392) 文学园地、社团及活动(396) 小
说概述(400) 西西的小说(420) 金依的小说(424) 各种通俗小说
(427) 高旅、石人、董千里、金东方的历史小说(432) 诗歌概述(441)
何达的诗(460) 黄国彬的诗(463) 戴天、何福仁、古苍梧的诗(467)
新生代诗人诗作(474) 散文概述(480) 曾敏之、吴其敏、罗孚、黄蒙
田、夏果的散文(498) 小思、董桥、彦火的散文(508) 框框杂文(519)
戏剧、电影文学概述(528) 李援华、杜国威的剧作(539) 儿童文学概
述(543) 何紫、阿浓的儿童文学(546) 文学评论概述(552) 胡菊人的
文学评论(559) 杜渐的文学评论(564)

第七章 前过渡期的香港文学(1984—1989) (567)

栉风沐雨的 80 年代文坛(567)儒商文学现象(571)文学园地、社团及活动(574)小说概述(578)东瑞、陶然、颜纯钩、陈浩泉、陈娟的小说(595)海辛、林荫的小说(614)钟玲、施叔青的小说(620)亦舒、严沁、李碧华、林燕妮、岑凯伦等的通俗小说(627)诗歌概述(641)犁青的“新山水诗”(654)蓝海文的“新古典主义诗”(658)张诗剑、黄河浪、王一桃、羈魂的诗(662)散文概述(673)梁锡华、也斯的散文(692)陈耀南、林洵的散文(699)金耀基、夏婕、华莎等的游记(705)戏剧、电影文学概述(714)儿童文学概述(722)宋诒瑞的儿童文学(729)文学评论概述(731)黄维梁及其《香港文学初探》(736)林真、璧华、忠扬的文学评论(739)

第八章 后过渡期的香港文学(1990—1997) (745)

第三次文学高潮开始兴起(745)纯文学与俗文学并驾齐驱(750)作家队伍的新结构(753)文学园地、社团及活动(756)小说概述(758)老作家的新探索(773)微型小说一瞥(776)各种通俗小说(780)梁凤仪的“财经小说”(782)诗歌概述(788)晓帆、春华、吴正的诗(798)散文概述(805)潘铭燊及其散文(822)戏剧、电影文学概述(825)儿童文学概述(833)文学评论概述(838)丁平、黄傲云、梅子、李远荣的文学评论(848)

结束语 (854)

后记 (861)

绪 论

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有特殊的时空，诞生于这特殊地区和时空中的香港文学，也有其特殊性。要认识香港文学的特殊性，有必要先对香港的发展历史及其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作一番概略的探讨。

—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原属广东省东莞县，后划归宝安县。这个原只有 5000 人口的海岛渔村，过去是海盗出入之所。1941 年英国强行占领香港后，同一天宣告香港为自由港。所谓“自由港”就是实行贸易自由、企经自由和汇兑自由。在当今号称世界三大自由港的美国旧金山、巴西里约热内卢和中国香港中，香港以其最自由、最开放、功能多、能量大、多国多方都获利而最负盛名。

打开世界地图，看中国漫长的海岸线，香港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黑点。然而，一百多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香港就像一匹脱缰的骏马，飞快地冲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由一个昔日寂寂无闻的南海小渔岛，发展成现代化、多元化的综合性国际经济中心，

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明珠”。杨奇主编的《香港概论》一书，概括了香港奇迹的几种主要表现：

“一、香港自然资源贫乏，却富甲一方。香港土地贫瘠，矿藏稀少，却拥有大量经济资源（资金、人才充足，信息灵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二、香港面积很小，能量却很大。香港只有 1074 平方公里和约 620 万人口，而它在国际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却比一些面积和人口多于它几十倍的国家还大。”“三、香港是英国人当作‘殖民地’来统治的地方^①，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自由。”“四、香港竞争剧烈，却容易赚钱。香港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国际资本争夺市场的搏斗虽然残酷，但投资回报率很高。”^②

香港发展经贸有诸多优势：诸如港阔水深，四面环山，是个天然的避风港；二战以后一直保持稳定繁荣；有强大祖国为后盾，长期以来得到多方面的支援，与内地的贸易就占香港外贸 65%；地处亚太地区的中心位置，交通四通八达，是世界海运交通的重要通道，航空亦然，为世界航线的枢纽之一；时差条件对它经营国际金融业务十分有利，为 24 小时连续运转的接力点；占人口 98% 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在十大香港财团中，中国人占了 7 家（李嘉诚、包玉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陈曾焘、邵逸夫）；实行科学管理，注重市政建设，少天灾，等等。拥有上述因素，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轻工业、航运、旅游、信息中心，文教出版事业极为发达。香港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8 种产品出口值或出口量名列世界第一（成衣、毛皮服装、玩具游戏机、手表成品、收音机、电筒、手提照明灯、照

① 中国政府曾在联合国发表声明，不承认香港是殖民地。

② 杨奇主编：《香港概论》，香港三联书店 1990 年 10 月版，第 5~6 页。

相机和钟成品)，1989年，外贸产值高达1,133,291亿港元。它还在中国内地和海外大量投资。香港的文化设施也丰富多彩，所谓“文化沙漠”，是不切实际的。

香港素有“东方明珠”之誉，举世赞赏这座美丽的国际名城。香港不是天堂，也非地狱，是个多层次多结构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香港社会格局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一百多年来的史实告诉我们：香港是个华洋杂处的社会。少数人挥金如土，多数人克勤克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寸土万金，穷奢极侈，社会风气不好。

香港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高度商业化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金钱高”的社会风气，人际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情薄如纸，唯利是图，铜臭熏天。自由竞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毒化了整个社会。所以说这是个矛盾对立统一的多元的美丑参半的现代社会，一场场无形的战争时时刻刻席卷社会，一个个黄金美梦困扰着人们。

香港是个藏龙卧虎的社会。凡开拓者最敢冒险，最能拼搏，最善钻营，也最富创造精神。百年来，大量造反者、叛逆者、逃亡者、落难者和亡命之徒聚集在这里。他们大多是冒险家、投机商和勇敢分子，其共同特点是灵敏机灵，勤奋武勇，有胆有识；或铤而走险，或忍辱负重，或出奇制胜，或为非作歹，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在这自由世界里，风云际会，变幻莫测，时沉时浮，毁誉荣辱，千变万化。有的偶发致富，洗心革面，弃恶从善；有的沉沦深渊，自甘堕落；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时至今日，培养出大批奇才、怪才、鬼才、歪才、奴才和天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令人叹为观止。行行出状元，处处出黑帮；一方面精英荟萃，一方面歹徒麇集，蔚为奇观。

香港是个知识爆炸的社会，这里报社林立，书店报摊密如蛛

网，电报、电话、传真畅通世界各地，信息极灵，科技发达。知识带来文明，科技带来进步，人才带来财富，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带来繁荣昌盛，法治的自由港吸引了全球的财富，于是港人有了信心和希望，产生了自爱、自尊和自强，追求荣誉与幸福、效率与享受。更因历次革命运动的洗礼，日据时期的黑暗统治，使港人记忆犹新，饮水思源；特别是新中国的胜利与成就，极大地鼓舞了港九同胞的爱国热情，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更使他们热爱伟大的祖国、民族和乡土，热爱五千年来 的传统文化、美德与习俗，其中尤以文化人为甚。他们历来忧国忧民，坚韧拼搏，自强不息，有教养、有学识、有卓见，一专多能，愿为祖国效劳，支持内地改革，盼望祖国繁荣富强，好让海外赤子扬眉吐气。

作为反映香港社会的一面镜子，香港文学虽然草苗争长，斑驳陆离，发展缓慢，历经挫折，但随着社会的演变、时代的进步和回归的日近，已逐步走上健康、进步和繁荣的道路，前景光明灿烂。

二

香港著名学者作家梁锡华在《想一想香港文学》一文中对香港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如下结论：“香港文学的起头，是拜大陆南来知识分子之赐。”又说：“把香港文学（中文）的大旗扯起，并且迎风把它扬得猎猎作声，是近年的事。”“香港文学是叨了中国政策转变之光，才有今天的地位。……香港文学以至台湾文学，若

缺了中国方面的提携，要打进世界文学市场颇有困难……”^①这是十分精辟的结论。

由于偏处一隅，远离当时的革命中心，香港新文学起步较晚，发展缓慢。20年代之前，香港还是一个文化氛围淡薄的殖民地城市，几乎没什么文学活动可言。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之下，经过鲁迅、胡适、许地山等文学大家拓荒播种后又经侣伦、杰克等本土作家的惨淡经营，香港新文学荒原上终于出现片片绿洲。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文化人涌入香港，由此掀起第一次文化高潮（即1937—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南来作家北归，文坛再度沉寂。抗战胜利后，数以百计的作家再度来港，文坛旋即活跃起来，出现了第二次文化高潮（即1946—1949年）。据香港作家、文学史家小思的统计，30年代中叶至40年代末，“知名的文化人来港的超过二百”。^②当年的香港，不仅是内地作家躲避战火的庇护所，而且成了他们能够继续从事文学写作的较为安宁的乐园，茅盾、夏衍、萧红、郭沫若、戴望舒、徐迟等人，就是把香港当作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基地。南来作家只是视香港为临时的庇护所，并没有长期定居香港的打算，他们时刻关注战局，盼望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好重返家园。所以，他们身在香港，却心系大陆。

南来作家在香港期间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浓重的中国情结，一扫殖民地文化色彩。从他们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的作品来看，取材基本上与香港社会脱节，反映的都是内地的人和事，偶尔有作家将目光投向香港这一暂居地，一般也是对这殖民统治社

^① 梁锡华：《想一想香港文学》，见《己见集》，中国学社1989年版第120页。

^② 小思：《漫漫长路上求索者的报告》，见《香港文丛·代序》第3页，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

会的阴暗面作一番暴露，而未能表现出其全貌来。这不仅是由于南来作家对香港社会不了解、不关心，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场民族圣战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他们提起笔来的时候，有意识地要为抗战大业出一份力。人来则兴旺，人去则沉寂，三四十年代香港两度出现的潮起潮落的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当时的香港文学，已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30年代以前香港文学创作中的本地特色已难觅踪迹。

在两次文化高潮中的香港文坛，南来的内地作家取代香港本地作家成为文坛主流，几乎所有的文学活动，都是南来作家所发动和倡导的，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几乎都出自内地名作家之手。在文协香港分会的理事名单中，看不到香港本地作家；在中国文化协进会的成立大会上，也未见香港本地作家受邀。刚刚萌芽的香港本土文学，湮没于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卉之中。作为香港本地作家，处于这一个大时代，看来内心也会有些失落感。正如黄傲云在《抗日战争对香港文学的冲击》一文中所说：“在中国文学这个母体内，香港文学这个新生婴儿，学会爬行后，便要流浪街头了。”^①张吻冰、岑卓云等香港本地作家，纷纷改写流行小说去了。尽管如此，三四十年代香港两次文化高潮的兴起，对于香港本土作家走向成熟毕竟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大批南来作家、尤其是内地文坛杰出作家，直接向香港年轻的本土作家呈示了他们功力深厚的作品、丰富的创作经验及其富于魅力的文学大家风范，对香港本土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他们日后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人称香港新文学是“移来的花果”，此言不无道理。本时期的

^① 黄康显（黄傲云）：《抗日战争对香港文学的冲击》，载《香港文学》第130期第4页。

香港新文学，准确地说应该是“香港的中国新文学”。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香港新文学在整个中国新文学史上应当占有席之地。然而，从国内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中，大多见不到香港新文学的地位及其在整个新文学史上的影响。我们只是在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①中，看到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的香港文艺运动作了评介。事实上，香港新文学对抗战前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新文学的重大影响，是不应低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地和处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香港在社会制度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加之香港的新文学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香港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工作者频繁地往来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文学书刊更是相互流通，没有划分什么界限。可以说，当时的香港文学和中国内地的文学连成一片，并不存在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独立于中国新文学之外的香港文学。1949年之后，中国内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等种种原因，在英国殖民当局占领下的香港就与祖国处于暂时隔离的状态。香港的文学也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有了自己的特殊形态，同内地的文学主流有着明显的差异。诚如刘以鬯所说：“香港新文学，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约在本世纪20年代发轫，而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发生重大转折。这一文学实体，虽素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一支，但因萌发于特殊时空之下，涵汇了中西文学的有利因素，所以独具姿采。”^②然而

^① 见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册第3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见《香港文丛》封底，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

应当指出，尽管经受了百余年的西方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长期冲击，香港文化的内涵并未脱离母体文化的本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是香港文学的根基与底座，影响、制约着香港文学的生成与发展。1949年以后，香港与内地虽有较长时期的隔离，但并未因此而产生可归入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学。此时的香港文学仍然是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创造出来的，所反映的主要是中国人的生活。对此，刘以鬯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香港文学穿的是英国义父的衣服，喝的是中国母亲的奶汁。衣服可以更换，母奶则是身体需要的营养料。”^①

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香港与内地人民、文学工作者和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日益扩大，因而，当代香港文学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形态的组成部分。香港文学的“本土性”，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性”不能相提并论。过去，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夸大了两种制度的差异性和敌对性，错误地把香港视为“大染缸”，而忽视了都是龙的传人这一最大的共同点，以致伤害了骨肉同胞的乡土感情和爱国热情。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对华禁运，港英追随于美国之后，50年代初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如驱逐爱国侨领黄长水和著名作家司马文森等人，关闭我进步文教机构等等，致使香港越来越脱离母体，重英文轻中文，诱使华人全盘西化。随着通讯事业飞速发展，香港文学产生了很强的外向心态，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出高度的兼容性。也由于我们政策失误，封国锁边，少了亲戚情和乡土谊，文艺界从此少了交流，甚至中断了联系。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纷纷返回内地参加建设的香港文化人，后来多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受辱，历尽磨难，使港人闻之寒心；另

^① 刘以鬯：《谈香港文学》，载《香港作家报》1995年11月1日第1版。

一方面，内地大批“落难文人”、右翼文人于建国前后蜂拥流入香港，在香港美新处的支持和美元的扶植下，香港报刊、出版社林立，几乎垄断文坛和出版界，左右两方力量突告悬殊，一时反共声浪鼎沸，不仅席卷港岛，而且波及海外华人社会，于是整个文坛主潮向右转。台湾此时反共文学甚嚣尘上，对香港文坛向右转，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 50 年代初以来，香港本土居民激增，而且人口流动性逐步减少，港人开始形成了独特心态、性格和意识形态。从香港人口上看，1949 年 200 万，1959 年 300 万，如今已达 620 万。从经济发展看，60 年代开始起飞，70 年代末以来空前繁荣稳定。从政治上看，由左向右转化，恐共心理严重。这期间，香港文艺界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疏离母体而日益西化。

70 年代后期，祖国内地结束了十年动乱，随之而来的“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对香港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祖国内地现实主义文学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和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对香港文学产生很强的冲击力。自 1980 年 9 月《新晚报》召开“香港文学三十年”座谈会之后，“香港文学”一词正式提出，并引起研究者兴趣。1984 年，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文本在北京签定，香港过渡期宣告开始。

“九七”回归这件大事提上议事日程后，推动香港文学走向勃兴。王仁芸在《一九九七与香港文学》一文中认为，“一九九七”对香港文学来说，是个重要的契机：“一、一九九七问题打破了香港与中国多年来的隔阂。……把香港的命运联系到中国的命运上，将是香港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二、一九九七除了促使香港作家关注中国外，也促使他们关注香港的现实。”“三、一九九七在

一定程度上正在冲击香港人的政治冷感。”^① 上述观点是有充分依据的。“九七”意味着主权在两个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间实现和平的交接，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物，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关系到 620 万香港人的切身利益，不管你属于哪一个阶层，从事什么职业。过去，香港人曾自诩为“经济动物”。不问政治，只知赚钱，这是众多香港人的写照。然而现在不同了，香港回归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这与每一个香港人的命运休戚相关。今日的港人，甚至比普通的内地老百姓更加关心祖国内地的时局变化，更加关心改革开放的国家大政方针，谁都知道，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以内地的繁荣稳定为前提的。香港诗人春华说得好：“香港正处在风云际会时，香港有血有泪的曲折历史，波澜壮阔的丰富的社会题材，东西文化荟萃的桥梁，应该产生巨大的划时代的有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的作品。”^② 确实，过渡期和回归对香港文学而言，是一个造就大手笔作家、酝酿大制作的时代。

进入过渡期的香港文坛出现了可喜的现象。长期以来由于不同思想倾向和文学流派而形成的各种壁垒和小圈子逐渐被打破，许多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作家，开始坐到一起来，共同探讨香港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问题。许多文学刊物都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方针，接纳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老作家黄思骋深有感触地说：“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展望。过去的，无论成功、失败，都已成为过去。希望我们以前‘左’、‘右’分清

① 王仁芸：《一九九七与香港文学》，载《香港文学》第 1 期第 28 页。

② 见杨匡汉：《迷目而幸福的星辰》，载《当代诗坛》第 19 期第 157 页，香港银河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的情形，现在不再存在了。现在大家都无所谓左右了。大家都为了中国，为了中国的未来，实在是没有界限的。”^① 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广大香港作家的共同心声。进入过渡期的香港文学，从创作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也出现可喜的现象。一些长期拘泥于传统的写实主义方法的作家，在他们的近作中也开始注意吸取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一些热衷于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则开始将艺术视野投向现实社会。香港过渡期文学头四年在转折中勃兴，在过渡中繁荣。但自 1989 年起，又出现滑坡现象，与香港经济腾飞速度相比，香港文学实绩很不相称。

如上所述，从 1920 年至 1949 年的前 30 年，为香港现代文学的发轫、拓荒、萌芽、成长期，从 1950 年以来的四十多年，为茁壮、繁盛期。后四十多年的香港当代文学大致以十年为一期，即 50 年代为左、右两派壁垒分明的对抗期（即反共与反蒋文学相对抗）；60 年代为缓和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和平共处；70 年代以来为横向交流期；80 年代中期开始进入过渡期，出现了第三次文化高潮。1950 年以来的四十余年间，香港文学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既有别于祖国大陆的文学，有别于台湾的文学，也有别于海外华文文学，因之在海内外华文文学世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具有香港自身特色的香港文学的产生，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自 50 年代后期开始，香港本土作家崛起，由内地南来的“落难文人”也逐渐适应、熟悉了香港，纷纷将笔触对准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于是，相继出现了反映下层社会小人物悲苦命运的“乡土文学”，暴露资本主义商业都市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种种阴暗面的“都市文学”，以及受西方

^① 见黄思骋在 1980 年 9 月《新晚报》举办的“香港文学三十年”座谈会上的发言。